

ZHONGGUO:BU PINGHENG FAZHAN DE ZHENGZHI JINGJI XUE

中国：不平衡发展的 政治经济学

王绍光 胡鞍钢著

(中文版)



院图书馆

中國计划出版社

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文版）

王绍光 胡鞍钢 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王绍光，胡鞍钢著。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10

ISBN 7-80058-774-6

I. 中… II. ①王… ②胡…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不平衡-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4901 号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by Shaoguang Wang and Angang Hu
Copyright © 1999 by M. E. Sharpe, Inc.
ISBN 0-7656-0204-0

本书英文版由 M. E. 夏普公司出版，本书中文版的专有
出版权属于中国计划出版社，侵权必究。

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文版)

王绍光 胡鞍钢 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 3 号楼)

(邮政编码：100837 电话：68030048)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 印张 215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80058-774-6/F · 435

定价：17.00 元

内 容 提 要

改革 20 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明显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严重挑战，其中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愈来愈突出，成为影响中国持续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最大挑战之一。

对地区发展差距的理论假说有两种：一是新古典主义的“趋同论”假说；二是倒 U 字型曲线假说。实际上，地区发展自然趋同趋势是不存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自然条件差异性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改变，相反是政治与经济两类因素的相互作用深刻地影响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及其相对差距。作者提出了第三思路即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地区差距变化的格局，不仅探讨了形成这种格局的经济原因和经济后果，而且还研究了它们的政治原因和政治后果；不仅提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经济主张和经济政策，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建设建议。

作者不仅考察了主要经济指标的地区差距，而且还考察了与经济发展极其相关的多方面指标的地区差距，例如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口特征、劳动力特征、经济结构、外贸与外资、技术特征、文化水平、消费特征、公共服务水平、获取信息能力、人文发展指标等，从而揭示了中国存在着多层次化、多层次指标的地区差距。

作者根据增长账户计算方法分析了 1978—1995 年期间各地区增长的来源：有形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增长余额

(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益、结构变化、体制改革等因素)。同时分析了各地区资本积累的来源：国内资本、国外资本、跨区域资本流动以及资本与储蓄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区增长快，有些地区相对增长慢。

作者所提出的分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政治成因的分析框架取决于两个重要变量：一是政府缩小地区差距的政治意愿是强或弱；二是政府影响资本流动的能力是强或弱。因为政府仅有缩小差距的政治愿望而缺乏干预的手段与能力，同样也无法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

作者的主要结论是：在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平等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政府坐视不平等任意扩大是不正常的；不平等的扩大在市场转型中不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使社会相对公平的市场改革之路；不平等的扩大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有效的增长既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改善公平；政府政策偏好对加剧扩大不平等或缩小不平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调整收入不平等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是削弱中央政府实现再分配能力的重要原因。今后中国地区发展政策目标应当定为，在短期或中期内首先阻止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缩小各地区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在中期和长期努力缩小经济发展相对差距；更长期的目标是缩小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最终目标是消除绝对不平等。对这个最终目标我们只能不断逼近，却永远无法达到。为此，作者提出 6 项必要的行动：取消向沿海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实行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重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援助；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保证各地区人口享有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为贫困地区“雪中送炭”；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增强落后地区的发展能力。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1)
第一节 问题的背景	(1)
第二节 争论的焦点	(3)
第三节 地区差距问题的重要性	(5)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	(9)
第二章 理论分析框架	(22)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趋同假说	(22)
第二节 不平衡增长学派的倒 U 曲线假说	(29)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35)
第三章 1978 年以来地区差距的变化	(45)
第一节 衡量尺度	(45)
第二节 人均 GDP 及增长率的地区 差距变化 (1978—1994 年)	(51)
第三节 省区内的不平衡：贵州和广东	(66)
第四节 少数民族地区不平衡发展	(68)
第五节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	(72)
第六节 地区差距的主观感受	(76)
附录 3.1 数据说明	(84)
第四章 各层面的地区差距	(89)
第一节 单一指标与多重指标	(89)
第二节 资源禀赋	(92)
第三节 经济结构	(102)
第四节 人类福利	(117)

第五节	总结	(138)
第五章 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经济成因		(152)
第一节	产出增长的最直接来源	(153)
第二节	资本积累的来源	(164)
第三节	总结	(174)
附录 5.1	增长账户计算方法	(181)
附录 5.2	对各地区资本存量的估计	(184)
附录 5.3	对各地区要素比重的估计	(187)
第六章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政治成因		(191)
第一节	分析框架	(191)
第二节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193)
第三节	改革时代的政策倾向	(196)
第四节	改革时代中央汲取财政能力	(203)
第五节	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日益扩大	(212)
第六节	总结	(215)
第七章 针对不平等挑战的政策响应		(223)
第一节	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已形成严重挑战	(223)
第二节	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	(227)
第三节	政策目标选择	(232)
第四节	正确处理三大关系	(234)
第五节	采取六种必要的行动	(238)
第六节	总结	(242)
相关书目		(250)

第一章

导言：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第一节 问题的背景

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是世界第三大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经济活动的地区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必然有显著的空间差距。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继承的是一个极为畸形的经济。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几个主要沿海城市。尽管沿海省份只占 11.34% 的国土面积，但它们却创造了 77.6% 的工业总产值。而其他省份的工业总产值总共才占 22.4%。西部地区尤为落后，虽然它们的地域面积占了全国的一半多，但工业总产值只占 8%。^①

新政府立意解决生产力和收入分配均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在华北、西北和华中发展新工业基地。在此期间建设的 694 个项目中，大多数都在内陆地区。^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满足。1956 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演讲中，再一次详细阐述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在他看来，使 70% 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其他地区却与现代化无缘，不仅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接受的。为了加速内地的工业化，他建议把更多的工业设施安排在内地。他相信，只有这样，工业的布局才能得到平衡。^③

毛泽东时代确实是生产力在空间上进行前所未有的重新配置的时代。由于其强大的汲取能力，^④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政府

强有力地控制着资源的地理分布。这一时期的投资政策明显倾向于边远和落后地区。发达省、市，如上海的财政收入大量外流，而不发达省份获得了巨额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⑤另外，在 60 年代中期，中国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始建设大三线。^⑥从 1964 年后期到 1971 年，几十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从沿海省市和同苏联接壤的地区搬迁到内陆。同时还建设了数百家新的企业。1956 年至 1978 年间，在中西部共建了 2000 家大中型企业。这种投资政策大大地促进了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增长。^⑦比如，华中地区农、轻、重的比例在 1965 年是 71：15：14。而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这个比例却变为 44：22：34。同期，该比例在西部由 69：16：15 变为 40：23：37。^⑧

除向欠发达地区投资外，财政转移支付也用来缩小地区收入以及公共品和服务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政府的转移支付使消费比产出的分布更平衡。^⑨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人均消费水平曾现出越来越平等的趋势。^⑩

尽管落后地区迅速发展的代价看来是比较高昂的，但是，许多人现在相信就全国以往的增长而言，毛泽东的政策是以效益换来了平等。

1978 年开始，中国改变了政策导向，把重点从平等转移到效益上来，从此进入了中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期。而且所有 30 个省份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就绝对水平而言，所有地区的经济条件都有所改善。不过，相对而言，各地区的效果却迥然不同。也许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平衡发展。用市场经济来代替“再分配”的国有社会主义经济，鼓励专业化而反对自给自足的政策，这种改革旨在重新调整价格、重新分配资源和重构空间分配。所有这些势必导致地区间的收入转移。然而，重要的问题是减缓了还是加深了业已存在的地区间的不

平等。这是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对改革以来地区发展的研究对于评价中国向市场过渡是否成功是很重要的。^⑩近年来改革的空间含义也成为关于中国政策的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在中国准备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的过程中已表现出来了。由于人们日益关注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该计划重新安排了国家发展的重点。现在缩小地区差距已经成为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年）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这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仍在继续进行。

第二节 争论的焦点

当前有关中国地区发展战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地区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2）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什么？（3）今日中国的地区差距是可以忍受呢，还是太大了？（4）如果存在地区差距，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缩小地区差距？对这四个问题，尚未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地区趋同（convergence）还是地区趋异（divergence）？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实证问题。然而调查的结果并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简单。中西方观察家们各持己见。有些学者认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后出现了区域趋同的倾向。^⑪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区差距在加大。^⑫还有些学者认为两种情况都存在。^⑬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来他们所用的分析单位、指标和测量方法不同。什么是评价地区差距变化的最好的方法，他们的看法也各异。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紧密相连。认为出现地区趋同的人把地区差距的缩小归功于市场的力量。^⑭

然而，认为出现地区趋异的人则要把地区差距的扩大归咎于改革政策和制度的变革，其中包括财政分散、投资战略上的地区倾向、价格体系的扭曲、工业结构的变化、开放政策、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等等。^⑨ 地区差距对民族团结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和决策者们激烈争论的第三个主要问题。^⑩ 地区差距会不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一些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一个大国来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地区差异是很自然的。当前的地区差距程度也许不小，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的时候？这些人坚持认为：绝对不是。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地发展经济。解决地区问题不应该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应该等待，要等到发达地区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⑪ 其他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当前地区差距不仅仅是太大的问题了，而是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已经发生了严重对抗。如果还要等待，地区间的矛盾最终会发展到无法解决的程度。地区差距再扩大会引起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认真努力缩小地区差距，至少不要使其扩大。^⑫

怎么才能缩小地区差距呢？那些相信市场会自动调节的人认为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取消市场僵化的东西。如果让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它们就会沿着经济场景去寻找“机会”或更高的回报。在这些学者看来，劳动力向富裕地区流动，资本则向相反的方向流动。最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回报或收入得到平衡，空间的不平等也随之消失了。^⑬ 然而，其他人则认为缩小地区差距需要政府干预。他们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基本公用事业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因而，外部的援助对改善这些地区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除了中央政府以外，没有任何机构能有这样的主动性和能力去做到这一点。^⑭

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不同无疑会影响西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对于参与这场争论的中国人来说，还有另一个决定因素，那就是利益冲突。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各地区也清楚地意识到各自的地方利益。然而，在“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源主要由中央计划者来分配，地区活动的空间很有限。改革大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再分配作用，各地都力争得到更多的资源。结果，地方主义意识大大加强了。很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地区的利益。因此，争论看起来是方法和理论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地区利益的冲突。^②

第三节 地区差距问题的重要性

当然，中国不是唯一的存在地区差距的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是所有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就是例证。^③即使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④因此，地区平等问题是学术界研究及政策争论的核心。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如此。

地区不平等之所以受到关注，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地区差距问题是经济增长问题。如果所有地区都同步增长，那就没有地区差别而言了。即使存在地区差距，只要贫困地区能够比富裕地区增长得快，前者也会向后者靠拢，从而使差距逐步消失。理论上是这样的，然而，实际证据却又成了争论的对象。不管怎样，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地区差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要找到地区差距的根源，我们就要追溯不同地区的长期发展的道路，要了解地区增长的动力。应当问：为什么地区增长率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⑤

此外，地区差距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道

德问题。除非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平衡的，否则，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从民族利益出发实现社会经济平等；要么就从对经济更有力的战略出发，只要整个经济更快发展，就让不平等扩大。^⑤没有人否认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性。但是，究竟谁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得到了好处？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某些地区的快速增长肯定使当地人受益，但是这不能保证其他地区人民的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因而，应当从更广的角度评价发展战略，把道德问题考虑进去。

有些经济学家往往把帕累托最优作为判断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帕累托最佳，或称之为“经济效益”，被定义为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降低某些人的效用就无法提高其他人的效用。正如 Sen 指出，“只有使一些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而另一些人享受荣华富贵，一个国家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不减少富人的奢华，极度贫困的人们也不会过好日子。”^⑥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帕累托定律进一步引申，不仅把“实际”帕累托改进而且把“潜在”帕累托改进（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包括在经济效益之中。^⑦后者指有些人受益，有些人遭损，但是，假设受益者能够补偿受损者而仍能过得很好，在这个意义上讲，总体上还是受益了。问题是这种再分配仅仅是假设，不一定实现。^⑧因此，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可能意味着越来越不平等。

可以替代帕累托标准的可能是 Rawls 标准：如果扩大不平等可以使穷人受益，更精确地说，可以使穷人的福利改善，才能被接受。根据这个标准，任何改善穷人前景的变化都是好的，即使贫富差距扩大也如此。^⑨很明显，这是一种虚弱的平等。另一种选择就是 Milanovic 所说的 Verkhovensky 标准。Verkhovensky 改进就是在改善生活方面让穷人比富人更快一些的运动。^⑩这样会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按照上述三个标准，社会可以从下面三个地区发展战略选择：(1) 让整个经济尽快发展，不管地区差距如何；(2) 只要贫困地区在增长，就不干预；(3) 帮助贫困地区以比富裕地区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都是可取的。但不幸的是，这两个目标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最大化可能加剧不平等，而追求地区平等会降低全国的增长速度。发展战略不能干脆以牺牲一个目标的代价来实现另一个目标的最大化。必须在二者间找出一个平衡点。然而找到这种最佳平衡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道德判断的问题。通过研究地区差距，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即任何发展战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原则基础上的。在研究地区发展时，不可能避免对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②

第三，地区差距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地区经济差距会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二者是紧密相连的。^③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感觉到的不平等引发的政治冲突数不胜数。地区间的不平等就像社会集团间的不平等一样会成为政治冲突的根源。地区不仅是地理和经济的概念，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概念。一个地区的居民对本地居民生活的关注往往胜过对其他地区居民的关注。结果，在那些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或收入增长明显比其他地区慢的地区，人们往往普遍存在不满的情绪。他们会认为他们的状况是中央政府不够关心所造成的。

同时，较发达地区的人会认为，他们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如果中央政府进行干预，让高收入地区补贴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会认为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纯属浪费，因为在他们看来支持低效益的经济活动是不合理的。因此，任何跨地区的资源再分配都可能招致富裕地区的抵制。

换言之，长期的地区差距不仅会使生活在相对贫穷地区的

人们沮丧，而且会使生活在富裕地区的人们疏远。历史告诉我们，当地区差距太大时，会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不同，加上经济差距，就会产生爆发性的局面。这样的例子有印度的旁遮普邦、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包盖维尔地区、加拿大的魁北克、意大利的伦巴第区、扎伊尔的加丹加省、尼日利亚的比夫拉、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⑨确实，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分种族居住的共和国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结果。^⑩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的主要起草人 Mahbub UI Haq（马尔·哈奇）在 1993 年就警告说，地区差距的扩大正威胁着 17 个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的文件起草小组特别提到卢旺达会有解体的危险，墨西哥的吉巴斯地区也可能会出麻烦。果不出所料，报告还没问世，这两个地方便出了乱子。哈奇指出：“地区差距是一项特别有力的指标，因为贫困本身并不能解释国家解体。但是，如果穷人集中在一个地区，他们就很容易被组织起来，正如在墨西哥吉巴斯地区的农民起义那样。在我们研究墨西哥时，吉巴斯地区的数据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尽管墨西哥政府十分不快，我们还是预测吉巴斯地区是个麻烦点，结果我们不幸言中。”^⑪

应当注意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 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把中国列为地区差距扩大的国家之中，并建议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差距不要进一步扩大。国家有必要进行干预，保证社会服务更加均等。”^⑫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对其他国家解体的预测很准确，因此对它的劝告不能掉以轻心。

地区差距带来的政治方面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当地区差距导致政治问题时，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也会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多数空间差距研究都强调诸如收入、就业、教育、移民等等社会经济变量。在解释地区不平等时，往往忽视

地区发展在政治方面的影响。然而，空间的权力关系显然会对地区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中央决策中有影响的地区比在中央决策中没有分量的地区更能为自己的发展争得更多的资源。所以，旨在平衡地区发展的计划不仅要分散经济活动而且要分散政治权力。^⑨

在知识分界的历史上，经济、政治和道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现代经济的发展大大地削弱了道德和政治的重要性。^⑩然而，要全面了解地区差距问题，必须从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

地区差距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以及其他人士都制定了衡量地区差距的方法并提出解释地区差距变化的理论。^⑪本书虽然主要是对中国的个案研究，它也会对内容丰富并日益充实的文献作出一份贡献。

本书的目的是探讨当前改革空间影响的争论中所涉及的各种关键问题。与近期的大多数著作不同，对于地区差距问题，它不只是从经济视角来研究而且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除了系统地研究地区差距的大格局外，还探讨了形成这种格局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而且，本书还提醒注意地区差距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还对如何缓解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地区差距造成的紧张局势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下一章是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假设，即趋同假设和倒U字曲线假设的评论。趋同论认为贫困地区将比富裕地区发展更快，地区差距只是暂时现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由于趋同趋势是一个自然过程，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去干预。

然而，倒 U 曲线论者却不那么乐观。这种观点往往与 Gunnar Myrdal 和 Albert Hirschman 的观点有关。^⑩这两个人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先进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拉锯过程。它受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即 Myrdal 的“扩散效应”(spread) 和“倒流效应”(backwash) 或者是 Hirschman 的“滴入效应”(trickling down) 和“极化效应”(polarization)。如果后者作用大于前者，各地区的增长速度和收入就会大相径庭。只有当前者的力量大于后者时，地区增长才会更趋向平衡。然而，这种情形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时才会出现。经济发展早期，地区差距趋向扩大。然而，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地区间的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发展成熟而最终消失。

我们不同意这两种观点。我们相信，若任其发展，市场的力量将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自然趋同的趋势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差距水平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相反，是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不发达地区和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用两个变量来解释空间不均衡增长：即政府代表不发达地区指导生产要素流动的意愿和能力。很显然，如果政府无意缩小国内的地区差距，地区差距就不可能缩小。即使政府打算缩小地区差距，但缺乏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地区差距仍然会扩大。只有当政府既愿意又有能力代表贫困地区实施干预，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政府的干预能力受其汲取的能力的制约。财政权力过度分散会大大地削弱政府的汲取能力，因此加剧地区差距。

第二章详细阐述我们的观点。

第三章为我们参与关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争论奠定坚实的基础。如上所示，研究者们用不同的观点阐述了中国改革以后的地区发展趋势。我们认为，这些不同观点反映了研究方法的不同。衡量地区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5 个参数：地区发展的